

交警大队的35个“孩子”

本报记者郑明鸿、李惊亚

近日，贵州遵义遭遇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遵义医科大学实行封校管理，该校大一新生杜海英时常叮嘱“姨妈”董君和四位“爸爸”，外出执勤时要注意防护，小心感冒。她同时也告诉董君，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支援抗疫一线，她未能如愿成为一名抗疫志愿者，觉得有些遗憾。

杜海英家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摆塘乡雷坝村，她从小失去父母，和爷爷、哥哥相依为命。但幸运的是，6岁那年，她拥有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位“爸爸”和一位“姨妈”的关爱。

杜海英的四位“爸爸”分别是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田维春、原大队长崔建勇、长顺县公安局长寨派出所所长简星和黔南州惠水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陈勋。陈勋曾在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多年，调到惠水县工作后，他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女儿”杜海英。

2009年春，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启动“宝贝计划”，以留守儿童、孤儿和事故致贫家庭孩子为帮扶对象。12年来，包括杜海英在内，这项计划共帮扶了35名孩子。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2009年春，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久旱不雨。当年3月，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到雷坝村给学校和村民送生活用水。在雷坝小学，一位老师告诉田维春和董君，该校一年级有个小女孩特别可怜，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些帮助。

这个小女孩就是杜海英。随后，田维春和董君来到了杜海英家。“刚进门，眼泪就出来了。”董君回忆说，杜海英那时和爷爷、哥哥住在一间小屋，隔壁就是牛圈，臭味扑鼻，苍蝇乱飞。目光呆滞，穿着不合身的脏衣服，是杜海英给田维春的第一印象。

在田维春的回忆中，杜海英的爷爷话不多。断断续续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他和董君才了解到，杜海英4个月时，母亲不幸去世。4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

此后，杜海英便和当时已70多岁高龄的爷爷，以及同样年幼的哥哥相依为命，姐姐则跟叔叔一家生活。

杜海英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几亩地里种点瓜果蔬菜拿出去卖。此外，年幼的杜海英还会和其他村民一起上山采药卖了换钱，“有空就



杜海英和四位爸爸的合影，左起分别是陈勋、田维春、崔建勇、简星。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供图

跟他们去，天蒙蒙亮就出发，村子周边的山我都去过”。杜海英回忆。

回到单位后，时任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田维春久久无法平静，他和大队长陈勋、教导员崔建勇、副大队长简星等人商量后，决定对杜海英进行帮扶。四位“爸爸”自掏腰包凑了1万多元，购买了钢筋、水泥和砖材，修缮杜家老屋，并拜托当地一位乡干部帮忙盯着，把控质量。

很多参与帮扶的民警说，他们最初只是想关心下杜海英，送点吃的、给点钱。但慢慢地，他们越来越放不下杜海英以及与她情况类似的孩子。

“怎么形容呢？就是心里面有一关过不去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指导员刘全说，“我们总觉得还要做些什么，而不是表示一下爱心就完了，要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为此，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请雷坝小学帮忙，确定了结对帮扶的13名孩子。

“小海英是我们的第一个帮扶对象，这个计划也可以说是因她而起。”董君告诉记者，计划取名“宝贝计划”，灵感来源于崔建勇说过的一句话：“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你永远的家人”

计划有了，但具体该如何帮扶？心思细腻的崔建勇说，“宝贝计划”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帮扶对象感受到温暖，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星、崔建勇和董君几人聚在一起，帮她选择具体填报哪所院校，还打了电话求助杜海英的高中班主任。最终，杜海英填报了遵义医科大学，并顺利被录取。

金秋9月，18岁的杜海英在田维春、简星和董君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学校。为庆祝杜海英如愿考上遵义医科大学，四位“爸爸”偷偷凑了5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惊喜”送给她。“姨妈”则早早为她购置了新衣服、毛毯和洗浴用品等。

杜海英说，能够遇见“姨妈”和四位“爸爸”，她很幸运，“我已经把他们当成家人了。”

“我是她‘爸爸’”

交警“爸爸”和他们的“宝贝”间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

一场交通事故，让梁小丽走进了长顺交警的视线。2013年7月，小丽奶奶在路边等她回家时，被一辆收废品的无牌三轮车撞倒，导致颅骨、胸骨多处骨折，颅内出血严重。因肇事者家中贫困，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老人的亲属决定放弃治疗。

刘全是那场事故的处警交警，当他处理完现场赶到医院时，小丽的奶奶已被亲属接回了家。他们随即来到小丽家，在一个角落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小丽。刘全清晰地记得，当时小丽的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无助。

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2003年2月，襁褓之中的小丽被丢弃在荒山野岭。幸运的是，长顺县摆塘镇五星村梁姓夫妇发现了已经被冻得脸色发青的小丽，并将她带回家中。

梁姓夫妇那时已经有了一对儿女，但仍决定收养这名弃婴，并给她取名小丽。在一家人的呵护下，小丽逐渐长大。

然而，从2009年起，厄运接连二连三地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那年春节，小丽的养父突发疾病去世。没过多久，养母也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经历击垮了小丽的爷爷，不久后，他也在睡梦中悄然离世。

两年内，小丽失去了三位至亲。为了养家，她的哥哥和姐姐早早离开校园，外出务工，留下小丽和奶奶在老家相依为命。

了解到小丽的悲惨身世后，经过刘全和同事多方努力，小丽的奶奶被送回医院，并得到有效治疗，病情逐渐好转。

此后，小丽成为“宝贝计划”的帮扶对象，祖孙俩从此多了一群“穿警服的亲戚”。出警或执

勤途中路过，到小丽家坐坐，送去各种生活、学习物资，成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们的惯例。

那时，小丽和奶奶居住的木结构房屋摇摇欲坠，已是危房。刘全和同事一起，凑了2万多元，给她们修了一处有5个房间的平房。刘全还在一家工厂为小丽的哥哥找到一份工作。

上初中后，小丽在校住读时发生的一件事，刘全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小丽在电话里哭着告诉刘全，她被同学打了。挂掉电话，刘全急忙赶到学校。

“了解清楚情况后，学校召集老师、教导主任和相关学生家长开家长会。自我介绍时，我自己是小丽的‘爸爸’。”刘全说，“我想让老师和其他学生知道，小丽有亲人。”

自那之后，小丽再也没被人欺负过。

高中毕业后，小丽去其他城市打工。逢年过节，她都会主动给刘全发短信送去祝福。

“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多”

初次遇见海英时的牛棚、孩子脏兮兮的小脸、新居里四个交警“爸爸”与海英幸福的笑容、宝贝们第一次穿上新衣时欢喜的笑脸、第一次为叔叔们系上红领巾时羞涩的神情、第一次进城和叔叔们过节时的欢笑……明亮的教室里，白墙上的投影让孩子们目不转睛。

2014年，“宝贝计划”5周年时，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们带着新买的衣服和书包，来到摆塘乡雷坝小学看望结对帮扶的孩子们，并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宝贝计划”五周年纪念电子相册。

往事历历在目，许多孩子哭了，在场的交警和老师们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随着“宝贝计划”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社会爱心人士联系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在雷坝小学，爱心人士援建了多媒体视频教室“彩虹教室”，方便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联系。

田维春说，近年来，农村贫困儿童受到极大关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宝贝计划”没有再纳入新成员。但已经结对的孩子们，他和同事将继续帮扶，直至他们步入社会。

“在别人眼里，我们给了孩子们很多，但事实上，这些年，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多。”董君说。

田维春说，今后如果发现需要帮助的学生和弱势群体，他们还会把“宝贝计划”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人民警察应该做的”。

(文中部分人名均为化名)

肛肠科女医生参加全球数学竞赛的背后

本报记者尹平

医生权隆芳终于休息了一段时间，只不过是躺在病床上。

今年3月的一天夜里，权隆芳上了十几次厕所。第二天上班时，她举步维艰。权隆芳知道是腰椎出了问题，但没想到脊髓已经从极度变形的腰椎里掉出来，压迫到了神经。

同事们把她送进了手术室。4个小时后，她的脊椎被打入6枚钢钉。36岁的权隆芳从医生成了病人。长期以来，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医生的她，总是要求自己能设身处地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次无奈“如愿”。

拒绝“躺平”

术后的3个多月，权隆芳只能在家躺卧。即使如此，她也拒绝“躺平”。有什么是躺在床上仍能做的？权隆芳说她能想到最简单的就是说话。她开始为普通话水平测试做准备，并于病愈后的10月顺利参加了考试。

其实权隆芳只是乐于尝试新东西。医生比多数其他行业从业者面临的考试要多，权隆芳比多数医生面临的考试更多。很多考试都是她“自找的”，比如普通话水平测试，再比如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今年是权隆芳连续第三年参加这个数学竞赛了。和前两年一样，她依旧没进决赛圈。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精英，权隆芳自知不是对手。那令人垂涎的百万奖金，她也从没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即使如此，“肛肠科女医生3次参加全球数学竞赛”的故事，也许是由于充满戏剧冲突元素，还一度意外上了微博热搜榜。实际上数学只是权隆芳的业余爱好之一，她还喜欢书法、绘画，现在也仍不时练笔。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权隆芳深知治疗不能仅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精神和情绪问题才是一些疾病的根源。根据对日常接触的病人的观察，权隆芳发现有一些中老年患者，因年轻时为工作和家庭做出的牺牲太多，生活得相当压抑，上年纪后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体现为躁狂或控制欲特别强等，并因此致病。于是，她格外告诫自己，不要重蹈老一辈的覆辙。

直到媒体报道，同事们才知道权隆芳竟然有这么多专业以外的兴趣爱好。此前，众所周知的是权隆芳一直在争取考医学博士。“权隆芳虽然一直很优秀，但她总是不满足，觉得自己还



十一月九日，权隆芳出门诊时给病人号脉。受访者供图

不够好，所以格外上进。”西苑医院肛肠科主任贾小强告诉记者，今年已经是她第五年为权隆芳申请报考博士签字。

权隆芳2010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权隆芳认为自己7年的专业学习已经为行医做好准备，但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现有的科研实力和思维意识，难以解决眼前遇到的部分专业问题，于是权隆芳决定申请读博士。数学竞赛什么的，无非是放松玩玩、重在参与；对于读博，权隆芳是认真的。

可是由于编制、工作年限、资格证明、导师安排等条条框框，此前4年，权隆芳的申请均铩羽而归。但是她不气馁，人家说她缺什么，她第二年就补什么。今年已经是权隆芳第5年申请读博，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在职博士。

“都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了，还非得拿个博士文凭，有必要吗？”权隆芳的朋友中，有人不理解她，听她讲自己的申博经历就觉得累，心疼地劝她不要折腾自己。

“有必要啊！”权隆芳非常坚定，“的确，博士毕业做的事，我现在也能做，但是博士阶段训练出的临床科研思维，我却一直缺乏，这就影响了我对病人的治疗效果。”读博以后，权隆芳发现，自己此前多年的思维定势得到突破，不再机械地按照书本知识去理解病症，而是结合导师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叠加时间等

多重维度去为人开方治病，更凸显中医治疗的思想精髓。

“不误”正业

虽然权隆芳当医生已十年有余，但至今仍见不得病人受罪。一次诊断出病人时日无多时，病人家属尚且镇定，权隆芳却先流出眼泪。她知道来肛肠科求医的患者，身体和精神的痛苦都非比寻常。权隆芳总要求自己用最轻柔迅捷的方式，为患者快刀斩乱麻。

权隆芳悄悄对记者说，有些给病人做的处理，她会先对自己试试。比如肛肠科治疗时常用的栓剂，总有病人反映塞不进去，有些医生会回一句：“那不可能！”就把依旧莫名其妙的患者打发掉。权隆芳会回家自己摸索着给自己塞，过程中她发现由于人的肠子是弯的，站着或躺着确实很难塞，但蹲着就容易得多。有了这样的摸索，她更知道该如何具体而微地指导病人。

除了常见的痔疮，还有一种肛肠病高发于老年群体中，即粪便嵌塞。这是由于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肠道蠕动功能退化等原因，便秘周导致。患者通常痛苦不堪，严重时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医治这类疾病，需要医生用专业手法帮忙清掏，权隆芳从不避讳。

曾有一次，有位80多岁的部队退休老干部被家人用担架抬来。由于一个月没有正常排便，老人肛周溃烂，感染高烧，奄奄一息。

权隆芳诊断老人是粪便嵌塞，上手帮忙从后庭清理出老人腹中隐患。

待老人半个月后来复查时，已恢复往日的军人姿态，腰杆笔直。权隆芳愣是没认出她来。“我就是那个之前来时都快病危的老太太啊！”老人激动地向她道谢。权隆芳说，这种时刻，总让她最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活的这59年，此前从没见过像权隆芳这么心疼病人的医生。”权隆芳曾经的患者李才告诉记者，3年前，他曾因直肠癌病险些危及生命。他的手术，包括术后的护理，都是权隆芳亲手完成，历时两个多月，最终治愈。“人家都说我倒霉了，怎么了生了这个病。但是我说我太幸运了，虽然生了这个病，但遇到了权医生这么好的大夫！”

李才住院期间先后3次进手术室，下身有5个刀口，每个伤口都有婴儿嘴巴那么大。由于病情特殊，术后他的刀口不能缝针，还要塞纱布蘸碘伏、生理盐水等药物进行消炎，每次操作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权隆芳每天为李才清理时，都温柔地和他拉家常，帮他放松下来，同时极轻柔地用最快速度完成。李才说他经常是刚感觉到痛就停止了。那年整个春节期间，李才都在住院。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初一，权隆芳都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病房，为他换药护理。“我那时也是有点倔，对权医生产生了依赖，不别别的医护人员插手，害她过年都不安生，也没法回家。可就算这样，一句牢骚话我也没听她说过。她对我始终那么关心和温柔。”

李才病愈后，实在不知如何感谢权隆芳，“无论送什么坚决不要”，他只能隔三差五发微信问候权隆芳，又生怕自己的问候会打扰到忙碌的她，没想到权隆芳总是及时有礼貌地回复——病人的每一份感激，权隆芳都十分珍惜。

年轻才要拼

权隆芳笑着向记者回忆说，她从十几岁时就决心学医，主要是因为自己爱给人帮忙，可是慢慢长大后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给人帮忙还经常被当成管闲事，只有医生这份工作，是无论怎样为别人帮忙都不为过的，所以她觉得当医生是目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即使如此，朱玉林也没想到，权隆芳不光帮自己治病，还为父亲救命。28岁的朱玉林

经权隆芳治愈后，复诊与她交流时，偶然提起了自己父亲的直肠癌。权隆芳格外关注，主动提出让朱玉林带爸爸再来西苑医院就诊。

“她对我父亲病情前后的关照，让我有时都感觉不到她只是我随机挂号碰到的医生，而更像我们自己家的亲姐姐。”朱玉林对记者说，已在其他医院确诊为晚期不宜手术的爸爸，在西苑医院成功做了手术。

朱玉林的爸爸术后化疗时，家里所有积蓄已花光，亲戚们借钱也已借遍。实在走投无路，朱玉林在网上发起了众筹，筹到了一万五千元左右，解了燃眉之急。朱玉林发现，令他一笔大额2000元的捐款，竟来自权隆芳，令他感动不已。

爸爸直肠癌确诊至今已两年有余，情况明显好转，朱玉林总感到对权隆芳无以为报。因为自己是从事幼教工作的，业余搞公益的少儿故事会，他便邀请权隆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确实是权隆芳非常需要的。

对病人照顾得越多，权隆芳对家人照顾得只能越少，尤其是对两个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是问妈妈什么时候下班，权隆芳的一对儿女却总是怯怯地问妈妈什么时候上班。他们害怕妈妈去上班，因为妈妈一旦上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下班。只有躺在床上养伤的那几个月，动弹不得的权隆芳才得以全天陪伴在孩子们身边。尽管孩子们也要帮忙照顾妈妈，但那是他们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因为妈妈终于只属于他们了。

今年9月开始读在职博士以后，权隆芳更忙了。她把一些线上的课程录下来，下班回家看。线下的面授课她要跟医院请假去上，结束后回来直奔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回到家，除了自己补课，两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也需要辅导。权隆芳和丈夫只能教孩子们尽可能独立，两代人各自在书桌前完成自己的学习。

权隆芳也想闲暇时沐浴在户外的春风中写生，或者听着轻松的音乐逛街，但现在这些都显得太奢侈。参加各种考试和竞赛，成为她争取自我的最主要方式。承受不住家里家外的压力时，她也忍不住掉眼泪。可是，想起家里老人常说：“井水喝不完，力气用不完。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天。”权隆芳赶紧停止自怨自艾。

看着身边的同事，尤其是前辈、领导，不仅要兼顾家庭、医疗、科研、教学，还要承担一些社会组织的职责，权隆芳更觉得自己没资格抱怨，“经常看到90多岁的院士还在工作，我们年轻人更不应该躺平了，年轻就是我们的拼搏最大的资本。”她笑着给自己打气。